



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

顾正红

方丽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 徐增元

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——顾正红

方丽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
(上海绍兴路54号)

新华书店及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.75 字数 25,000  
1978年11月第1版 1978年11月第1次印刷  
印数 1—50,000

统一书号：3074·493 定价：0.13元



## 目 录

引 言.....	1
不屈的穷孩子.....	3
反抗东洋老板的剥削.....	10
心里有了一盏明灯.....	18
二月罢工中的尖兵.....	26
准备投入更激烈的斗争.....	35
在反帝前哨壮烈牺牲.....	41

## 引　　言

跨进上海第二棉纺织厂的厂门，一眼就可以看到：在常青的松柏丛中，耸立着一座青铜色塑像。他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工人，昂着头，挺起胸，左手紧握着拳头，右手执着一根两尺多长的“打梭棒”。走近塑像，凝神细望，仿佛还可以见到他的胸口在剧烈地起伏，双眼喷射出愤怒的光芒。他，就是一九二五年在上海爆发的震惊中外的“五卅”反帝爱国运动的革命先烈、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——顾正红同志。

顾正红同志是在我们党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共产主义战士。幼年，受尽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，之后，在日本资本家开设的纱厂里，又受尽帝国主义资本家的剥削欺辱。正由于顾正红同志亲身遭受了旧社会三座大山的剥削和压迫，在接受了党的教育以后，他能迅速觉醒，犹如破土而出的禾苗，茁壮成长起来。在党的领导下，他勇敢地站在反帝斗争的第一线。在一九二五年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的“二月罢工”斗争中，他光荣地参

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。同年五月，在执行党的决议，带领工人面对面地和帝国主义斗争中，被日本资本家开枪杀害，英勇牺牲。顾正红同志的牺牲，成了“五卅”反帝爱国运动的直接导火线。

顾正红同志牺牲时只有二十岁。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，在敌人的枪口面前，不畏强暴，不怕牺牲，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宁愿前进一步死，决不后退半步生的革命硬骨头精神。顾正红同志为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献身的革命精神，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。

革命烈士顾正红同志永垂不朽！

## 不屈的穷孩子

黄海的浊浪，卷着苦涩的海水，拍打着贫瘠的苏北沙岸。由于海水的长期侵蚀，虽然已经是春末夏初的时节了，但这儿却还看不到春日的景色。田头坡地上到处是白色的盐碱痕迹。

一天，在离海边不远的一个村庄外，一群穷苦孩子在田埂上挖野菜。这长期被海水侵蚀的盐碱地上，连野菜也长不出来啊！孩子们看看逐渐西下的夕阳，再看看连篮子底也没盖满的野菜，他们担心着，今天晚上拿什么掺和着填饱肚子啊！

“看！那边坟地上有野菜，到那边挖去！”一个十二三岁模样，皮肤被海风吹得又黑又红的孩子指着不远处一块略高的，有树木遮盖着的坡地说。他，就是顾正红。

大家正要向坡地奔去，突然一个头戴瓜皮小帽的胖小子窜出来，把手一扬，说：“那是我们家的祖坟，谁敢去动一根草？”他看到孩子们一下怔住了，更大声吼

叫着：“谁敢去，就抽他的筋，剥他的皮。”

顾正红紧走两步，站在孩子们的前面，恨恨地瞪着这个小崽子，手里那把挖野菜的刀攥得紧紧的。地主儿子看到这个样子，一边向后退，一边学着他地主老子的腔调说：“你凶？你还敢到我家来讨饭，我就放‘黑子’咬你！”

原来，不久前有一次，顾正红家里又是一连几天揭不开锅，弟弟妹妹们饿得直哭，顾正红忍住眼泪，不声不响地拎起破篮子出去要饭。谁知刚走近地主家的黑漆大门，里面突然“呼”地窜出一条大黑狗，一口咬住顾正红的小腿肚，顿时鲜血直淋。地主的这个小崽子站在门口的高台阶上哈哈大笑。面对着狂笑的地主小崽子，呲牙咧嘴的大黑狗，顾正红使劲地站了起来，捏紧两只拳头，一步步向高台阶逼去。这时，路过的贫农大伯怕他再吃地主的苦头，拉住了他，顾正红强压下满腔怒火，转过身子，心里暗暗地说：“狗崽子，等着吧，总有一天要和你算这笔帐！”

今天，顾正红听到地主儿子这样耀武扬威地嚎叫，心里“腾”地烧起一把火，他再也憋不住了。冲上去，一把抓住地主儿子的衣领，“看你再凶！”用力一摔，把地主儿子摔到秧田里，滚了一身泥。“来看活泥鳅！来看活泥鳅！”站在旁边的穷孩子，个个都感到十分痛快，拍手



王也良 刘守蛟作

大笑。眼看着“小少爷”变成“活泥鳅”的狼狈相，顾正红心里更无比痛快。

这件事，发生在江苏省阜宁县漳沟区传和乡一个村子里(今滨海县正红人民公社正红大队)。一九〇五年，顾正红就诞生在这里的一个贫农家庭里。在万恶的旧社会，顾正红一家同千百万劳动人民一样，在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，过着极其痛苦的生活。他们一家三代租种着地主的田地，祖父被迫在地主家做长工，父亲也经常在地主、富农家打零工。全家人一年到头辛勤劳动，血汗孕育着谷穗生长，稻麦堆满了地主的米粮仓，自己却过着吃不饱、穿不暖的牛马不如的生活。

一九一三年，顾正红八岁了。那时，封建军阀政府为了扩张各自的势力范围，在帝国主义的扶持下，更加紧了对人民的掠夺。在农村，他们疯狂地霸占土地，加强地租盘剥。广大劳动人民在水深火热的半殖民地、半封建的社会里挣扎着，反抗着。

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里，与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地主残酷剥削的同时，严重的自然灾害又连年不断地威胁着穷苦的人们。那一年，苏北地区，开始是水灾，顾正红家乡一带的田地房舍一夜之间成了一片汪洋，房屋倒了，庄稼淹没了，没有来得及躲避的老弱妇孺和牲

畜的尸体在水面上漂流着。面对这样严重的自然灾害和悲惨的景象，反动的军阀政府非但不加过问，反而变本加厉地向广大劳动人民进行勒索。军阀政府的苛捐杂税，地主土豪的重租盘剥，还是不能少交分文。这些毒蛇猛兽寄生虫是在穷人的骨头里榨油啊！洪水刚退，虫灾又来，只见蝗虫乌云般地铺天盖地而来，片刻功夫，遭劫的田里几乎颗粒无存。

天灾人祸使广大的农民劳累一年，连交地租的谷子也凑不起来，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一九一三年，顾正红的父亲为了给全家寻找一条活路，不得不暂时撇下妻子儿女，一个人背井离乡，逃荒到外地谋生。

父亲走了，家中的日子更为艰难，尽管顾正红当时只有八岁，但是作为长子，他不得不帮助母亲挑起生活的重担。每天，天不亮，顾正红就和母亲一起下田干活，种田以外，还得带领着弟妹去摸鱼捉虾，挖野菜。每当顾正红的母亲看到骨瘦如柴的孩子饿得连走路都摇摇晃晃，想到孩子的父亲外出一年多还音讯全无时，就愁得整天以泪洗脸。一看到母亲难过，顾正红就象一个大人似地劝慰母亲，并且竭力忍住自己的饥饿，把仅有的野菜粥省给弟弟妹妹吃。顾正红一家就这样挣扎在饥饿线上。

封建地主的残酷压榨，生活的苦难折磨，使年幼的

顾正红对黑暗的旧社会、对敲骨吸髓的地主阶级充满强烈的仇恨，他见到地主家的孩子仗势欺人，就挺身而出，用他那经过劳动逐渐结实起来的拳头，狠狠地教训打骂穷人的地主儿子。为此，顾正红的母亲也不知遭到地主的多少辱骂，但她从不埋怨自己的孩子。她认为儿子这样做是对的。

对于地主的崽子，顾正红是这样毫不留情，但是对待自己的小伙伴，顾正红却充满了阶级友爱。一次，当出门几年的父亲第一次寄回来一点钱的时候，母亲眼看着常年吃野菜稀粥的孩子，特地去买了一点粗粮蒸了一点土糕。当顾正红拿到这难得的食物时，他飞快地把常和自己一块摸鱼捉虾、挖野菜的小伙伴找来，把糕掰开，分给每人一小块，自己也只吃一小块。小伙伴们吃着笑着，顾正红看了打心眼里感到高兴。平常吃饭的时候，顾正红一看见门外有端着空碗贪婪地望着他们的孩子时，也总是不声不响地把自己碗里的野菜粥倒给他。有一次，顾正红又把自己刚端上的一碗野菜粥倒给了一个孩子，只见那个孩子狼吞虎咽地一口气就把它喝完了，还端着空碗怔怔地站在那里，顾正红看他实在饿得慌，就赶紧进屋再去盛了一大碗粥统统倒给他。顾正红拿着空碗回到家里，他母亲奇怪地问他：“今天怎么这么快就吃完了？”顾正红把门外孩子的

情况告诉了母亲，他说：“我们穷，这个小孩比我们更穷，我把稀粥都给他吃了。”母亲赞许地看着儿子，默默地把自己碗里的粥又倒给了儿子。

顾正红爱憎鲜明的阶级感情，和他刚强的性格，自幼就得到了家乡贫下中农的普遍喜爱。特别是一些老贫农，每看到他走过时，总爱捋着花白的胡须高兴地说：“正红这孩子人穷骨头硬，将来长大有出息。”

一九二一年，新的浩劫又来了。苏北滨海一带又发大水，顾正红家的两间土坯房子也被洪水卷走了。但是官府照样派捐，地主照常逼租，顾正红一家在家乡实在没法过了，就同母亲、弟妹一起，搭乘了同乡人的一条小木船，从家乡来到上海，寻找在厂里做工的父亲。

## 反抗东洋老板的剥削

顾正红和母亲、弟弟、妹妹，经过千辛万苦，长途颠簸，好不容易从苏北来到上海，找到了在苏州河畔一家油厂做工的父亲。对于妻子儿女的到来，顾正红的父亲真是一则以喜，一则以忧。喜的是从此一家人又可生活在一起相依为命；忧的是自己的工资是那样低，终年拚死拚活的干，还填不饱自己的肚子，以后的生活可怎么办？

旧上海是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，地主、资本家的天堂，而对劳动人民来讲，则是血泪斑斑的地狱。幸亏穷工人们的帮助，顾正红一家六口总算在沪西一个贫民窟里安了家。可那是什么样的家呵！在方圆不过几尺的泥地上，几根竹子撑在地下，再用几张废旧的芦席片卷成半圆形往上一包，这就算是顾正红的“家”了，大人进去连腰也伸不直。在高低不平的潮湿泥地上铺一点稻草，烂棉絮就算是“床”，房子外面到处是垃圾和粪便。有的墙角落里还丢着用破席子包着的婴孩尸体。

老鼠白天也到处乱窜。碰上下雨天更是污水横流，臭气四溢。顾正红问母亲：“怎么上海是这个样子？”因为在乡下的时候，每当天灾人祸逼得人们实在过不下去了，有些人就一根扁担挑上所有的东西，扶老携幼地往上海逃荒。更有那从上海去招收工人的，为了骗取廉价的劳动力，还胡说什么上海全是高楼大厦，有好多大工厂，只要进厂当了工人，吃穿就不用担心。可是现在呢，顾正红所看到的上海和同父亲一样在厂里工作的工人，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。他问妈妈，妈妈叹口气，摇摇头，没法回答。他又问在上海做了几年工的父亲。父亲愤愤地说，这里是上海，但我们蹲的这个地方是穷人的上海；在租界里，还有一个洋人和富人的上海。顾正红茫然地看着被油厂生活压弯了腰的父亲，还是搞不清楚为什么会有两个上海？

父亲工资低微，没法养活一家人。顾正红就又带着弟弟妹妹，和附近的工人子女一起去捡煤渣，拾破烂。在烈日当空的炎夏，顾正红带着弟妹，赤着脚，走在晒得发烫的路上，爬进还冒着热气的废煤渣堆里，满头大汗，满脸乌黑地捡着煤渣。冬天，刀子似的凛冽寒风，吹透了人们的肌肤，顾正红却穿着单薄破烂的衣裤和小伙伴们一起去拾破烂。一家人就是这样拚死拚活地干，还是和在农村时一样吃不饱，穿不暖。旧社会，

可真是逃得了地主，逃不了资本家、帝国主义的欺榨、剥削和压迫，天下乌鸦一般黑，到处都没有穷人的活路啊！

一九二二年，顾正红的父亲东托人西说情，奔波了近一年，总算把刚满十七岁的顾正红，介绍进了日商内外棉九厂（今上棉四厂）做扫地工。

顾正红一进厂就承受了沉重劳动的压迫。他每天要做十二小时的工，逢到星期六，还要加“礼拜工”，就是说，这一天要连续做十六或十八小时的生活。顾正红必须成天拿着那把比他的个子还要高的竹扫帚，不停地、费劲地扫着。工人进厂就象囚徒被关在监狱里。

顾正红起早摸黑地在工厂里做了几个月，但是每到发工资的日子，他却拿不到一文工钱，他不知道工资已落进日本资本家豢养的狗腿子——“拿摩温”的腰包。又一次发工资的日子，顾正红照例没有发到“工票”（领工资的凭据）。他愤愤不平地去问“拿摩温”：“为什么我做工没有钱？”“哼！骨头还没有长硬，倒要起工钱来了！”“拿摩温”连正眼也不瞧他一下，一边走一边说。顾正红听到“拿摩温”这么说，真是一下子火冒三丈，他一把抓住“拿摩温”的衣服：“怎么，做工不给钱，这是什么道理？”“拿摩温”把手一甩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什么道理，回家问你老子去！”对“拿摩温”的蛮不讲理，顾正